

青年视界·沈杏培主持

现代化的褶皱：新世纪小说城市书写的三个向度

陈 静

摘 要：新世纪小说城市书写中的知识分子叙事、街道叙事与小镇叙事，分别从精神空间、日常空间与过渡空间三个向度，完成了对现代化“褶皱”的勘探。三重向度从内到外、从精英到平民、从中心到边缘，共同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异化的悖论、日常经验的温度与过渡地带的焦虑。城市书写由此不再停留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想象，而是深入人之存在的核心地带，打捞那些被遮蔽的经验与情感。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城市书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见证。

关键词：新世纪小说；城市书写；知识分子叙事；街道叙事；小镇叙事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期，这一剧烈的空间重组，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形态，更重塑了其存在方式与精神结构。小说作为时代经验的载体，如何回应这一变革，成为考察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以往的研究者在论及城市书写时，大多停留在器物层面，摩天大楼、消费场所、外来务工者等成为解读城市的主要符号，形成了一套以可见的现代性为中心的阐释范式。但这套范式往往将“现代化”处理为一个自明的、单向的进程，忽视了其内部的断裂、混杂与张力。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和琳琅满目的消费品固然构成了城市的表象，然而那些在权力与欲望中挣扎的精神主体、在日常空间中

沉淀的生活经验、在城乡夹缝中生成的过渡形态或许构成了城市书写更为复杂的图景。

本文尝试将城市书写视为一种空间叙事的多重实践，从中提取出三个相互关联又彼此区隔的向度。其一，知识分子作为城市文明的承载者与反思者，他们的精神嬗变折射出“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困境；其二，社区、超市、舞厅等局部空间成为日常经验的载体，它们保存了被遗忘的城市记忆；其三，介于城乡之间的城镇作为连接乡土文明和城市生活的枢纽，从更微观的角度刻画了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细节。这三个向度分别对应着城市空间的三个层次，即精神空间、日常空间、过渡空间。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

境,到街道空间的日常经验,再到小镇叙事的中间状态,三者从内到外、从精英到平民、从中心到边缘,共同完成了对现代化“褶皱”的勘探。

一、精神空间： 知识分子叙事与现代化困境

城市现代化的核心,终究是“人”的现代化。而知识分子作为城市文明的承载者与反思者,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嬗变,便成为观察城市书写的关键切口。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应物兄》中的应物兄,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祛魅”过程。

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李洱的《应物兄》、阿袁的《上邪》等作品,不约而同地将笔触指向大学校园这一城市现代化的产物。在这里,知识分子本该秉持的理性精神与人文坚守,却在权力与欲望的裹挟下逐渐异化。卢桢曾表示,“城市文学要想立体写出‘人的现代化’,至少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人物必须具备现代化的品格,与以往相比具有文化先进性;二是这些品格应是人物在汲取城市文明的营养之后才能获得的,是城市对他们精神形塑的结果”^①。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当知识分子被城市文明“形塑”时,也面临着被异化的风险,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现时代比其以前任何时代都更是一个谋杀的时代……人类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了直接的目的而被轻而易举地出卖”^②。

如果对《应物兄》的小说属性做更严格的界定,它当属许子东笔下的学院派小说,“意思是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是学院中人,情节主要发生在大学内外,主题也牵涉学术问题,也就是儒学能否在中国复兴。最重要的是文风、细节、腔调也都处处充满了学术腔,引经据典掉书袋”^③。作品以应物兄为人物核心展开叙事,应物兄在哈佛访学时的导师是程济世先生,而他本人又是济州大学学术泰斗乔木先生的学生和女婿。从美国访学回来后,他整理出版了一部研究《论语》的书,然而在出版人季宗慈的操作下,书名由《〈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变

成了《孔子是条“丧家狗”》,署名也从“应物”变成了“应物兄”,这让他的知名度又上了一个台阶。济州大学的校长葛道宏计划筹备成立儒学研究院,并引进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儒学大师程济世先生回国任教。在他看来,不管从人脉关系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考虑,应物兄都是担任联络人的不二人选。程先生是济州人,少时记忆中的仁德丸子、拉二胡的灯儿大师、济哥的叫声让旅居海外多年的他在思乡时有了具体指向,他曾多次表示要叶落归根。葛校长此举一来可以慰藉程先生的乡愁,二来可以提升济州大学的社会排名,从高校行政领导的角度出发,这是一个双赢的举措。兴师动众组织人马考证程先生家的老宅地址、黄兴和铁梳子等商人以建“太和”研究院为名而行掠夺财富之实、生物系的华学明教授用死去济哥的卵细胞恢复它的鸣唱等劳民伤财之举,则不在他的考量之列,因为“越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越是会有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好理由’”^④。但作者最匠心独运的地方不是在于对以上学、官、商众多人物相继登场的群像描写,而是在于让主人公的性格明明有其内在矛盾性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一成不变,因为应物兄已经“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变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可的接受”^⑤。

大学校园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之一,也曾一度被认为是乌托邦一样的存在。但是20世纪以来,与乌托邦相对的概念恶托邦开始被作家及读者接受和重视,“已经有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指出,恶托邦的出现,其实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以及各种对抗资本主义的相对论述,包括马克思主义等多种理论相互激荡下,所产生的一种叙事。这类叙事投射了一种与现实世界生存情境息息相关

① 卢桢:《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② [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第3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③⑤ 许子东:《应物兄何止是一个人啊》,《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

④ 李洱:《应物兄》,第8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情境,哪怕貌似完美,其实更等而下之”^①。虽然《应物兄》的言不尽意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一九八四》的暴虐和集权还相距甚远,但作者已经将现实层面的不可说表露无遗。如果必须为应物兄等人的活动场域做一个命名,它可能更接近于福柯所讲的异托邦,“异托邦是一个空间或想象的存在,被社会所命名、所树立,却被‘包括在外’。异托邦折射一个社会的欲望或恐惧,但也因为其另类的位置,形成与主流权力或拒斥、或同谋的微妙互动——像一面镜子中左右里外对调的反影”^②。《应物兄》最核心的空间背景是济州大学,它表面上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校长葛道宏还特别差遣校长办公室的费鸣去协助应物兄筹办儒学研究院。这看似是为应物兄提供人力支持,实际上因为费鸣占着校办编制,他不走,与校长有着暧昧关系的美女小乔就进不了校办。在这个场域里,隐形的权力与财力对知识分子的随意驱使和拿捏,可以看成作者建构、介入异质空间的一种努力。正如福柯理论所阐释的那样,异托邦与乌托邦的不同之处在于,异托邦确实存在于现实社会,是被“权力单位所规划、设想的一种空间。这个空间是被隔离的却又是被需要的,用以治疗、规训、怀柔、取悦社会成员”^③。应物兄被大学校园规训成了一副现代犬儒模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来临的时候,他因为发表了几场不合时宜的演讲,还替别人修改润色了几篇更加不合时宜的演讲稿,差点被学校开除”^④。乔木先生适时保护了他,在先生影响下,应物兄不仅改掉了多嘴多舌的毛病,甚至在某些场合成了锯嘴葫芦,对前辈的学术问题不挑战,对商人势利的儒学热情不拒绝。这种克制与收敛赤裸裸地揭示出当代知识分子被所谓现代化改造、异化的真相,正如应物兄所感受到的,“我不但没有获得满足,反而有一种置身于冰天雪地的感觉”^⑤。

当代大学校园在权力的掌控与运作下,不仅塑造出了大批犬儒主义者,还为知识分子去品格化,且逐渐走向世俗化、琐碎化、欲望化提供了实践的温床。阿袁是当代颇负盛名的学院派女作家,新世纪初便以《长门赋》强势进入读

者视野,其后更是佳作不断,《虞美人》《汤梨的革命》《郑袖的梨园》《子在川上》《鱼肠剑》《上邪》等作品好评如潮。阿袁擅写学院中知识分子在学术以外的生存事件,当知识分子本该具备的坚守与信仰被解构后,理解他们的精神困惑、拯救他们的生存危机才获得了更多言说的可能。

2017年初的长篇小说《上邪》实际上是由三个互相关联的中篇组合而成,朱荣和孟渔,姬元和汤弥生,孟渔和姬元,故事中的人物互相穿梭、对视、辩驳,各有各的痛苦和困惑,这些痛苦和困惑碰撞在一起,便形成了奇特的文学景观。中文系的老师孟渔和资料室的姚老太都喜欢在周二上午九点半左右从北面的窗户往外看,因为每当这个时候,“朱荣老师就会从她老公沈教授的车上下来,然后袅袅婷婷地走进人文楼的北门”^⑥。不过孟渔和姚老太看的重点不一样,“姚老太太重点是看沈一鸣教授,其次看朱荣,孟渔呢,重点是看朱荣,其次看沈一鸣”^⑦。在姚老太眼里,沈教授符合她对男人的所有要求:学问好——化工系高分子材料专业,清华和麻省理工的双料博士,且是师大最年轻的博导;性情好——业余爱好是独自下围棋,诸如此类。朱荣虽然一般,但是能嫁给沈教授,这就足够了。但是孟渔恰好持相反观点,他觉得一个男人“如果娶了朱荣这样的女人,那么怎么爱都是应该的,都是不过分的”^⑧。然而他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并没有站住脚,孟渔以一种病态的执拗,强迫朱荣臣服于原始生理发起的挑战。吊诡之处在于,当朱荣受不了这种不伦而毅然从丈夫身边离开时,孟渔却再也对朱荣生不出一丝旖旎的心思了。福柯在《词与物》中讲道:“我们都熟知几个互不相干的事物突然靠近会产生出的困惑;把这些事物碰撞在一起的这个纯粹的列举活动独独具有它自己的魅力……它们的协同

①②③ [美]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第280-281、282、28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④⑤ 李洱:《应物兄》,第5、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⑥⑦⑧ 阿袁:《上邪》,第4、5、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性和明证性才保证了并置在一起的可能性。”^①只有当朱茱的美貌与沈教授对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朱茱才对孟渔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沈一鸣赴美访学,孟渔登堂入室后,他想象“茶几下面的灰红相间的地毯是他的,插了芦苇和绿萝的花瓶是他的,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和墙上的青花瓷板画是他的,书架上相框里的那个漂亮女孩儿是他的”^②。这种确证的此在和根本的非在所造成的分裂感不断撕扯、拷打着孟渔,所以当朱茱离开了那种鬢乱横陈的风情之家后,孟渔的异托邦实践也随之结束了。

如果说《应物兄》呈现的是知识分子在权力场域中的沉浮,那么阿袁的《上邪》则揭示了欲望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侵蚀。小说将知识、欲望、权力并置于大学这一空间,可一旦知识失去了批判性,理性屈从于欲望,知识分子便不仅是城市文明的引领者,同时也成为一个需要被审视和反思的对象。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叙事构成了城市书写中颇具反思性的维度。城市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精神场域,应物兄的“冰天雪地”与孟渔的“分裂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精神空间的褶皱。知识分子作为城市精神的承载者,其困境与挣扎构成了城市书写中无法被平滑叙事覆盖的“隆起”。

二、日常空间： 街道叙事与城市经验的微观载体

如果说知识分子叙事关注的是城市的精神高度,那么街道叙事则潜入城市的毛细血管,在日常生活的褶皱处打捞被忽视的城市经验。从老舍笔下的北京胡同,到王安忆书写的上海弄堂,再到新世纪作家对社区、超市、舞厅的勘探,局部空间的叙事功能日益凸显。

平民出身的老舍可以说是对皇城百姓最有感情的作家,他对京城百姓生存状况的书写有着一种别样的深情,“老北京四合院的生活情境确实有点类似小城镇的乡居味道,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京城仿佛就是由许多个小胡同联结起来的小城镇组成的”^③。老舍开辟、建构的四合院、小胡同和茶馆将庙会、婚丧嫁娶、饮食、喝茶、逗趣儿等日常生活及世俗风貌都囊括其中,

老北京人家琢磨的生计和念想得到了丰富且深刻的呈现。除此以外,作为走出国门的新式知识分子,老舍还在自设的局部空间中用现代的、批判的自省眼光来重审本民族的陋习与沉痾。在三幕话剧《茶馆》中,老舍以老北京裕泰茶馆的兴衰为背景,通过茶馆中轮番登场的三教九流之口,从日常细微处展示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艰难与疼痛。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统治阶级的顽固并不能挽救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大厦将倾。虽然茶馆中到处张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但常四爷偏偏好谈国事,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而被特务宋恩子和吴祥子抓去坐牢。时至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抗战胜利国民党特务在北京横行时期,“莫谈国事”的纸条在茶馆中越贴越多,然而有研究者指出,“茶馆总是人们谈论政治的地方,各种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为其服务。在那里,国家竭力实施社会控制,精英传播其改良思想,普通民众谈论政府政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等”^④。据此可以推断,在社会处于动荡与变革时期,城市文学的主题和内容远不止恋爱、交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那么简单,普适性的人情冷暖固然蔚然大观,可小人物对政治的关注、对民族的期待、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延安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近四十年被评论家们认为是城市文学的枯水期。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考量,为了不被冠上小资产阶级低级趣味和反动腐朽思想的帽子,作家们鲜少去描写城市的庸常生活。直至知青大批返城,上海的弄堂、北京的胡同、苏州的巷子等城市专属格局才再次回到读者视野。以王安忆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墙基》,到90年代的《长恨歌》,再到千禧年的第一部长篇《富萍》,“王安忆的写作积累客观上为‘上

①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第2-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② 阿袁:《上邪》,第4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③ 施战军:《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④ 姜进、李德英主编:《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第16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海书写’提供了相当充足的经验”^①。有评论者在阐释《富萍》的文本精神时认为,“王安忆的文化理想就是要塑造与表达一个‘文本化的上海’,‘上海的文本化’是王安忆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②,而在她建构的“文本化的上海”里,弄堂是不可或缺的意象。《长恨歌》中,王安忆将上海的弄堂分为几种:最有权势之气的石库门弄堂、最常见的上海东区新式里弄、严加防范的西区公寓弄堂、全面敞开的棚户区杂弄。在这些上海的代表性建筑群落里,中西合璧的同时兼顾经济和功能的合理,不仅为传统生活方式留有了余地,还守护着普通百姓的日常念想,打磨着他们的内在人格。摘得“上海小姐”桂冠的王琦瑶从上海最常见的亭子间,辗转到昂贵的、戒备森严的爱丽丝公寓,最后流落到曲折幽深、藏污纳垢的平安里,每一处生活空间都与王琦瑶当下的生活一一对应。反之,弄堂的级别和规格也反映了居住者的生活水准和人生境况。在王琦瑶半个多世纪的激荡人生中,作者将个体经验融入对城市的理解中,“她没有追求表面繁华的具有‘符码’意味的上海,而是力求再现一个更人性的、更本质、更真实、更民间的上海。这样的上海是亲切的、温情的,也是琐碎的、苍凉的”^③。

新世纪走过20多年,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可随之而来的社区老化、城区改造、人口老龄化、婚恋观的嬗变也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在《空响炮》《街道江湖》中,90后作家王占黑敏锐观察到了这一点,“八九十年代,人们从弄堂搬进单元楼,逼仄的螺旋式空间变为敞亮的两室一厅,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居住更新体验。然而很快地,人们又匆忙搬出单元楼,去往更高的公寓,更大的户型。于是小区成了老小区,工人新村成了旧新村,留下来的,多是老人、穷人,以及外来务工的新居民,这构成了旧型社区在新世纪的钢筋水泥,也恰好代表着三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角色:衰败的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④。到了最新的小说集《小花旦》,她不断向城市纵深处逼近,以社区为蓝本,又从社区出走,游离与回溯,拓展与尝试,在人民公园、嘉

兴路、舟山路舞厅、大润发等或开放或封闭的复杂空间里,将个体对城市动态情状的复合体认娓娓道来。

中篇小说《小花旦》可以看成王占黑跨出熟悉领域、进入陌生空间、感知“扎劲又凄凉的生活”^⑤的分水岭。“我们小区的房子,二楼才住人,底下都是车棚……十来平的地方,面朝马路,做做小生意正好,许多人家便把车棚租出去了。于是早饭铺啊,租书屋啊,剃头店啊,一只只老鼠打地洞似的开起来。”^⑥“我”从小就在小区里的“巧星美发屋”剃头,老板小花旦原本过着混不吝的生活,他“绝非每天都肯开店的,钓鱼要去,舞厅也要去的。他店门口贴着告示,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时间:下午12:30—5:30(星期四休息)。但实际操作从不按纸上来办”^⑦。直到阮家阿婆死后,“巧星美发屋”连同二楼的住宅被小花旦的胞兄胞姐瓜分,小花旦才被迫结束了美发生涯。“游泳头”是我与小花旦之间的紧密连接,这种连接在我19岁的时候断裂了。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提到:“当一个空间被磨平擦净,就变得透明了。边际和过道是秘密和谜题的领地,也是他者诞生的源头。”^⑧在熟人社会中,闲言碎语的压迫塑造了一种伪装的、虚假的表象,化为废墟的“巧星美发屋”催生了一个全新的他者:给老阿姨们烫头并哄得她们服服帖帖的娘娘腔摇身一变,成了不被指摘的舞王。“我”在舟山路的舞厅里再见到小花旦时,“他满脸堆笑,抖着肩膀,肩膀抖落下细密的光亮”^⑨。一曲终了,“很多人涌

① 施战军:《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②③ 吴义勤、贺彩虹、刘永春等:《文本化的“上海”——新长篇讨论会之二:王安忆的〈富萍〉》,《小说评论》2001年第2期。

④ 王占黑:《街道江湖》,第25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⑤ 《王占黑、btr、张定浩、顾湘1“很多人都过着又扎劲又凄凉的生活”》,豆瓣网, <https://www.douban.com/note/789886703/>,2020年12月31日。

⑥⑦⑨ 王占黑:《小花旦》,第6、11、6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⑧ [德]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城译,第6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上来了,要签名,要挂历”^①,小花旦这一性少数者,终于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得到了正视。在另一个中篇《去大润发》中,王占黑将目光从城市的边缘地带转向了实体商超。在她看来,每一处空间都是个体现实活动的场域,她在观察并体验的同时,有意识地记录了时代发展对个体消费习惯和情感生成的深刻影响。小说中“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后疲惫至极,情绪恶劣,在公交站台鬼使神差与刚认识的黑T小伙一起坐上了大润发班车。班车里空空荡荡,除了我和黑T,只有驾驶员和另一乘客。驾驶员回忆起2000年前后大润发刚开业时的盛况,这趟免费班车每一趟都是“人扑扑满”^②。到了超市后,室内冷冷清清,零星的顾客和门口满满当当的购物车,无一不诉说着大润发如今的萧条。黑T敏感觉察到了“我”瞬间的眩晕感,经由他熟门熟路的带领,我俩在打烊前的大润发竟然生出了一丝暧昧的默契。新世纪之初,每一个城市居民或多或少都收到过大卖场的购物邮报,“9块9,19块9,现在想来,数字所对应的商品甚至不意味着任何物质欲望,无非是些让人看着就高兴的画片。这又和浏览电商不同,后者随花费的时间而徒增犹豫和焦虑,最后引发令人窒息的空虚”^③。线上购物的超宽选择面,在刺激个体欲望的同时又在稀释个体欲望,无所不在的平面感对一切现象之下的意义进行了解构。据此,当代消费方式的变革也许和情感的变动关系并不大,仅仅是因为时间深度的消失而已,正如杰姆逊所论,在后现代社会中,“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④。

老一辈作家中,范小青也热衷于将社区工作和街道生活作为介入当下的有效通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她就创作出了《裤裆巷风流记》等多部脍炙人口的“小巷文学”作品。有论者指出,范小青的创作“多从小处着眼,描写的是小人物的生活常态,从不刻意追求达成某种宏大叙述,但在其扎实细密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却往往可以显影出时代的风貌”^⑤。近年出版的《桂香街》是一部描写社区生活的长篇小说。主人公林又红原先供职的外企因信誉危机撤出中

国,导致她不得不赋闲在家,然而她又是个极具主人翁精神、极富责任感的人,在与桂香街居委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的身份转换。其中,林又红最大的贡献就是完成了桂香街小吃街的改造,此举既规范了城市街道的管理,又保住了小摊贩们的饭碗。作品通过大量细节勾勒出一个居委会干部庸常又琐碎的一天,并以此建构起一种独特的日常美学。居委会“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层、最微小的细胞,又是与广大群众联系最密切的。它算不上是政府部门,只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却承担了无数的政府的延伸工作,维系着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牵涉着百姓的信心和民心”^⑥,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搞不定的事情一旦拿到居委会来,便被合理化了。比如老史家门口对着小巷的一个墙角,因比较偏僻,许多人在此处随地小便,他三番五次找居委会来解决这事;原先开托儿班的王丽丽为了照顾生病的婆婆,只好把小孩锁在家里,让居委会的人帮忙看护……用王丽丽的话说,“你们居委会是干什么的,就是为居民服务的,居民有困难就该找你们解决”^⑦。正是在这个整天吵吵嚷嚷的居委会里,范小青从琐碎处窥见了当代人日常生活的大致轮廓。

无疑,王占黑与范小青都是观察城市局部空间的高手,且二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笔端指向了城市中普通个体的处境。在深入当代生活肌理的过程中,作家们以一种独特的审美视角,阐释了当代人的生存经验,不管是被社会孤立的边缘群体,还是社区中的普通居民,每个人都在私人生活的微小切口不断向外拓展,从这个角度讲,现实主义书写的边界也因此而进一步被扩大了。

①②③ 王占黑:《小花旦》,第67、91、10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④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第164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⑤ 李静:《虚构者带来的真相——评范小青长篇新作〈桂香街〉》,《艺术评论》2017年第6期。

⑥⑦ 范小青:《桂香街》,第416、183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三、过渡空间： 小镇叙事与城乡结构的重组

如果说知识分子叙事关注的是城市的精神内核,街道叙事聚焦的是城市的日常肌理,那么小镇叙事则呈现出城市的“外部”样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在地城镇化”使介于城乡之间的小城镇大量涌现,城—镇—乡的三元结构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小镇作为时代变革的第一目击者,其文学生产既不能简单归入乡土文学,亦难以纳入城市文学范畴,却恰恰成为观察当代中国的最佳窗口,正如刘大先所说:“小镇在中国是一种灌木丛式的存在……多元化的存在赋予了小镇文学里文学小镇的多样可能性走出单一的现代化冲突模式,进入到小镇的田野现场,才有可能发现更多别有洞天、包容并举的中国故事。”^①

当下的城镇叙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出走的作家们,“在城市生活中获得了现代性体认”^②,带着对故乡的隐秘眷恋,将其作为一个审美对象加以理性审视。比如付秀莹《陌上》《野望》、魏微《一个人的微湖闸》《异乡》《大老郑的女人》、鲁敏《思无邪》《风雪剪》《纸醉》、徐则臣《花街》《午夜之门》《耶路撒冷》等;另一类则同样是从小镇出走,可是融不进的都市和回不去的故乡之间的矛盾让这一部分作品蒙上了一层厚重的焦虑感。比如魏思孝《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余事勿取》、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南方旅店》等。

以付秀莹的“芳村”为例,“村北这一带,如今是芳村的开发区。皮革加工厂,皮具厂,养鸡场,养猪场,有大的,有小的,大大小小,都在这一片。早先其实都是田地,如今,田地变成了一片片厂房”^③。曾经依赖土地生存的人,有能耐的自己办起了工厂当老板,比如大全、增志;没能耐的进了乡镇企业挣工资,比如大坡、爱梨;两头都不靠的也能自己做点小买卖,比如小鸾;被时代浪潮裹挟的村民们无一不热火朝天地奔着自己的前程。在《陌上》和《野望》中,太谷县城也就离芳村十几里地,单从个体的衣食住行来看,城乡的差距似乎并没有很明显。就从粮食上来说,“翠台家里统共就二亩半地。当初

分地的时候,人口也少,后来这些年,添了进口,也是一大家子人了,地却一直没再动过。不够吃怎么办,买着吃呗。如今什么不是买?卷子、面条、烙饼、饼丝,连个饺子皮儿都有卖的。如今的人们,享福呀”^④。如果说付秀莹笔下的“芳村”是沸腾的、生机勃勃的,那鲁敏笔下的“东坝”则是平静的、温情中又带着疼痛的。《白衣》中陈冬生接替死去的老崔做东坝的赤脚医生,在村长王志高看来,这对他这样一个高考落榜生来说算是出人头地了。镇木器厂的会计邹虎撺掇陈冬生帮自己找门路去轻薄村里一个叫英姿的女人,可当陈冬生得知,因为老崔给英姿的儿子注射了过量的庆大霉素导致孩子失去听力,他便打消了肮脏的心思,反而对这个女人生出了无限的同情,可最终他还是在邹虎的威胁下将英姿推进了深渊。《颠倒的时光》中木丹是东坝第一个建大棚种西瓜的人,清明前后头道大棚瓜成熟了,东坝人第一次这么早就吃上了西瓜,木丹也卖了个好价钱。随着天气渐热,外面的地生瓜赛过了大棚瓜,等最后一批脚瓜收尽,大棚里像提前入冬似的萧条起来,木丹也陷入了不可名状的忧伤。《逝者的恩泽》中陈寅冬在西北工程队修铁路时与队里干杂活的古丽结合,生下了儿子达吾提。他为了给留在东坝的妻女和工地上的古丽、达吾提谋一份未来,蓄意谋划了自己的死亡。古丽和达吾提在陈寅冬死后一年投奔了红嫂,红嫂接纳了他们,并决定用陈寅冬的抚恤金给达吾提治眼睛。鲁敏是这样形容她笔下的苏北小镇的,“在东坝这样小而旧的镇上,每增加或减少一个人,都会成为一个事件”^⑤“人们酷爱窃窃私语,同时也愿意把善意加以放大和传播”^⑥,一户人家有几口人,甚至

① 刘大先:《文学小镇与灌木丛美学》,《福建文学》2018年第2期。

② 胡哲:《21世纪文学中的小镇青年“新人”形象》,《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③ 付秀莹:《陌上》,第7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④ 付秀莹:《野望》,第28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

⑤⑥ 鲁敏:《思无邪》,第101、113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

他们的亲戚从事什么工作,大家都了如指掌。就是在这种灰扑扑的空间里,人们的生存光景迥异于传统乡土社会,又有别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都市,“杂乱的街道、浓重的口音、疲倦的面容……这一切仿佛具有无穷的魅力,所有在田间地头或CBD中心找不到、看不清、抓不住、写不好的爱恨喜悲,扔到三线小城的红油汤底里一涮,忽然就变得味道十足”^①。

作家之间的代际差异也使得他们建构的城镇世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审美景观,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魏思孝在《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中展示了青年们所遭遇的种种生存及精神困境。在这里,时间的裂缝和空间的界限异常明显,当上一代人还在走街串巷畅聊家长里短的时候,下一代人已经转向赌博泡吧百无聊赖了。《你为什么不找工作》中的“我”总是通过从朋友那骗几百块钱来维持生活,成天幻想着如何发财,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潦倒,结尾处“你看,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工作”^②,有着一一种巨大的荒芜感。“如果上班工作是一种正确的常态,那么不这样选择的人是不是就该死,就应该变成异类去领受一份歧视的待遇?”^③可是就算去工作,作为城镇上平庸的大多数人,也未必能逃脱被歧视的命运。《混子》中艾庄东南角的村办印刷厂,几经易手后到了新上任的村主任高宁手里,摇身一变成了宁达塑编。时间一长,关于高宁的流言蜚语到处流传,“他们并不愿意相信高宁有什么本事,权色交易,以丧失尊严来换取体面的生活,更符合大家心目中这些人的做派,也更能冲淡他们的酸楚和恨意”^④。一日,厂里来了三个混混扬言要收保护费,高宁叫来了昔日一起胡混的兄弟,把三人教训了一通,“你们还想混社会,让你混吗……学点技术,比什么都强”^⑤,两代混混正面交锋后似乎也只给漫长的人生提供了“学点技术”这一条发展路径。朱白在评价魏思孝的小说时说道:“荒诞地去揭示那些本真的生活是小说的一种写法。在小说集里的荒诞并不是现实状态的荒诞,而是作为一种途径,一种试图去揭示真实的手段。”^⑥小城镇想进一步向现代转变的剧烈阵痛孕育了当下中国的典型图景,现代文明在此处被搁浅,城镇叙事既没有散发恨意

和刻意卖惨,也没有假装煽情,电动车、催婚、外卖员、流水线、短视频等无数被贴在城镇上的关键词恰恰就是被揭示的真实,正是这种真实,才有效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结 语

新世纪小说城市书写中的知识分子叙事、街道叙事与小镇叙事,分别从精神空间、日常空间与过渡空间三个向度,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经验褶皱。三重向度的交织表明,新世纪城市书写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如何“重构”了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知识分子叙事揭示了精神空间的异化,可见“人的现代化”并非线性进步,而是充满悖论与代价的;街道叙事打捞了日常经验的温度,展示了普通人是如何在城市里安放自身的;小镇叙事则呈现了过渡地带的焦虑,说到底现代化从来不是均匀覆盖,而是在城乡夹缝中留下无数未完成的、悬置的、矛盾的存在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城市书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见证,它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发展与阵痛,也为我们理解“何以为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长篇小说的现实关怀与文体变迁研究”(22JJD750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静,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当代小说。

① 李壮:《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小镇故事》,《北京青年报》2016年11月29日。

② 魏思孝:《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第10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③⑥ 朱白:《用自己身上的骨肉之痛诋毁轻薄(序二)》,魏思孝:《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第6、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④⑤ 魏思孝:《混子》,《十月》2023年第11期。